

多浅陋，又多言浮屠，其字画则往往工妙。”阮元撰《南北书派论》称：“南派江左风流，疏放妍妙，长于启牖；北派是中原古法，拘谨拙陋，长于碑榜。”阮元的说法，也只是大体归类而已。南方非无碑，若滇南之《爨龙颜》《爨宝子》，其奇古即不在北碑之下。

这二百年间，因南、北分裂，朝代更迭频繁，国势上不能与汉、魏、晋比较，下不能与隋、唐并论，而书法却极富特色。北方据河称雄，南土拥江而治，书法反因此而发扬了区域性的特色。中国书法流派之大分野，实自此始。欧阳修褒北贬南，谓“南朝士人气尚卑弱，字书工者，率以纤劲清媚者为佳”。赵孟坚则反之，谓北人书无晋逸雅，讥其为“毡裘气”。批评标准，从此不同。

第二节 在崇王思想笼罩下的南朝士大夫书法观

南朝自刘裕受晋禅建宋，历齐、梁、陈而终，凡一百七十年。

南朝各代，帝王臣庶多具才华，且嗜书好画，君臣陶醉，蔚然成风。

宋武帝刘裕、文帝刘义隆、孝武帝刘骏、明帝刘彧都擅书法。一般臣庶，如刘穆之、羊欣、谢灵运、范晔等人的书法也为书史所称道。刘宋书法，受献之影响最大。文帝、羊欣都师承于大令。羊欣与虞和有书论传世。

齐以高帝萧道成最嗜书，曾与王僧虔赌书，谓王曰：“谁为第一？”王答：“臣书，臣中第一；陛下书，帝中第一。”齐以王僧虔书名最著，僧虔亦祖述小王。

南朝文化，以梁最盛。诸帝重文好艺，帝室中能书者比比，而开此风气的即武帝萧衍。武帝曾与陶宏景论书。《书法正传》及《墨藪》均载有萧衍书论文章。梁论书风气最浓，萧子云有《十二法》，陶弘景与武帝论书书五通，武帝答四通，袁昂有《书评》一卷，庾元威有《论书》一篇行世，庾肩吾有《书品论》。这种盛况，与帝王的嗜好提倡关系很大。

较之前朝，陈的书法最弱。唯僧智永所传“永字八法”对后世影响较大。

南朝书法，全笼罩在二王遗荫之下，四朝名家，都是师承右军父子。羊欣亲受于子敬，时人云“买王得羊，不失所望”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谓：“羊欣思齐大令，举止依样。”王僧虔祖述小王，萧子云则效逸少，智永书则全守逸少家法。南朝名家，几乎全不出二王规模，乃至以二王法为品评标准。齐高帝评张融书：“有骨力，但恨无二王法。”张融答云：“非恨臣无二王法，亦恨二王无臣法。”在举世宗王的风气下，这无疑是空谷足音。

南朝接东晋之后，书法尽承于二王，且各朝帝王，都以王书风范为评论准绳，由此而助成一时风气。在学理方面，南方以儒学为胜，儒雅中和，是一般文士所崇重的仪态。加之，“南方水土和柔，其俗善变”^①，复因禁碑，笔墨多施之于缣素，故以流美的行草称世。君臣、士庶书札往来，书法是在上层的文人圈子中传布。唐人窦臬《述书赋》云，得见南朝真迹，计宋二十五人、齐十五人、梁二十一人、陈二十一人，皆为文士，这种情况，与北朝迥然相异。魏、晋遗风，南朝仍尚，一般士大夫“游玩山水，守拙乐静，求志林壑，造次之遇，遂纾雅顾”^②。虞和是南朝宋泰始年间人，为当世之人，此表署“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和上”。泰始为宋明帝年号，虞见当时书风，即有“古质而今妍，数之常也；爱妍而薄质，人之情也”的论说。虞为会稽人，这正是右军遗韵所存的地方。明帝善行书，于政务之余，耽玩翰墨。虞和《论书表》称：“陛下爰凝睿思，淹留草法，拟效渐妍，赏析弥妙，……机息务闲，从容研玩”^③。这虽是针对明帝而言，但当时士人的嗜尚，也与此无异。在宋初时，“朝廷秘宝名书，久已盈积”^④，以书法为玩好，从此肇始。

王僧虔以《笔意赞》最精妙，他首次明确提出“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”。这是对书法批评价值观念的一大开拓。这种美感境界的创造，须使“心忘于笔，手忘于书，心手达情，书不妄想”才有可能。重“达情”者，多求神采，艺术之区别于实用，即在于此。

南朝取士，不必以楷法为标准，故未坠入唐人沼泽。且去钟、王不远，楷法澹古，史称登极。降至李唐，以楷法取士，天下皆骛横平竖直，神采遂没。

① 《书林藻鉴》。

② 虞和：《论书表》。

③ 《论书表》。

④ 同③。